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中国经学学术编年（第五卷）

主编 郑杰文

吴国武 著

两宋经学学术编年

上

 凤凰出版社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中国经学学术编年（第五卷）

主编 郑杰文

吴国武 著

两宋经学学术编年

①上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两宋经学学术编年 / 吴国武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5. 7

(中国经学学术编年 / 郑杰文主编)

ISBN 978-7-5506-2120-6

I. ①两… II. ①吴… III. ①经学—研究—中国—宋代
IV. ①Z126.27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14896号

- | | |
|---------|---|
| 书 名 | 两宋经学学术编年 |
| 著 者 | 吴国武 |
| 责 任 编 辑 | 陆扬 汪允普 郭馨馨 |
| 出 版 发 行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25-83223162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fhcb.com |
| 经 销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 照 排 |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
| 印 刷 |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南通市通州经济开发区朝霞路180号,邮编:226300 |
| 开 本 | 880×1230毫米 1/32 |
| 印 张 | 42.625 |
| 字 数 | 1147千字 |
| 版 次 |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
| 标 准 书 号 | ISBN 978-7-5506-2120-6 |
| 定 价 | 268.00元(全二册) |
-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513-80237871)

本成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儒学学科建设”（批号09AZD051）
最终成果之一

本成果为山东大学“985”二期工程资助项目成果之一

总 序

儒家思想体系的形成肇始于周公制礼作乐,经后人发挥、补充而反映在儒家早期原典中。这类儒家早期“经典著述”,到孔子传学时已有“六经”(即《易》、《书》、《诗》、《礼》、《乐》、《春秋》),秦汉间“乐经”亡佚而剩“五经”。汉武帝“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使广大学子对传承、阐释、发挥儒家经典趋之若鹜,出现了数量众多的经学著述。经学著述所承载的经学成为历代王朝的主导学术,经汉学、宋学(理学)、清学(朴学)等发展阶段,留下了数以千计的注经、说经乃至改经的著述(如《中国丛书综录》即收此类著述 7646 种);20 世纪的一些中国学人继续从事此类研究,出现了数以千计的经学论著和数以万计的经学论文(参见林庆彰等《经学研究论著目录》各编);研究汉学的国外学者如日本学者也多涉此而留下数量众多的著述(参见林庆彰等《日本研究经学论著目录》),经学研究从而成为中国学术史乃至世界学术史上最为重要的学术研究门类之一。可以说,不了解中国经学的发展变化史,就难以真实把握历代封建王朝的政治思想和统治方略,就难以深刻认识历代文人的学术思想和文化品格,就难以切实了解中华民族的性格品质和文化风俗。

中国经学史的专门研究最迟从明代就开始了(如明人朱睦㮮有《授经图》20 卷)。其成果若按通史和断代史区分,前者流传较广的有清人皮锡瑞的《经学历史》(有中华书局出版周予同注释本等)、近人马宗霍的《中国经学史》(有上海书店 1984 年影印本等)、今人吴雁南等《中国经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 年)和姜广辉等《中国经学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另有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上海文艺出版社)、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以及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学生书局)、甘鹏云《经学源流

考》(广文书局)、李威熊《中国经学发展史论》(文史哲出版社)、日本人安井小太郎等《经学史》(林庆彰、连清吉译,万卷楼图书公司)、日本人本田成之《中国经学史》(孙俚工译,广文书局)等。流传较广的经学断代史类著作有章权才的《两汉经学史》(万卷楼图书公司)、王葆玟的《西汉经学源流》(东大图书公司)、洪乾祐的《汉代经学史》(国彰出版社)、程元敏的《三国蜀经学》(学生书局)、汪惠敏的《三国时代之经学研究》(汉京文化事业公司)、汪惠敏的《南北朝经学初探》(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章权才的《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汪惠敏的《宋代经学之研究》(台湾师大书苑)、章权才的《宋明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吴雁南主编的《清代经学史通论》(云南大学出版社)、李新霖的《清代经今文学述》(台湾师大国研所硕士论文)、田汉云的《中国近代经学史》(三秦出版社)等。

这些著述各有优长,但是也有一个共同的缺陷,那就是像姜广辉研究员批评皮锡瑞《经学历史》和马宗霍《中国经学史》时所说的那样,“此类著作的基本资料和问题意识来自于正史中的《儒林传》以及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朱彝尊的《经义考》等”(国际儒学联合会网,2006年1月20日登载姜广辉《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基础研究资料的选取面失之过窄。这不能过分责怪他们,在不能使用电子检索的时代,单凭作者一个人或者十几个人,要处理数以千万计的基础研究资料,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的。

但是,任何学术问题的研究都应建立在最充分地占有最广泛的研究资料的基础上,才能全面而不偏颇、深入而不肤浅。要想写出一套真实反映中国经学历史面貌和规律走向的《中国经学通史》,必须首先从梳理数以千万计的基础研究资料入手。这种梳理工作历代都有人在做,其成果如简博贤有《今存三国两晋经学遗籍考》(三民书局)、《今存南北朝经学遗籍考》(黎明文化事业公司)、《今存唐代经学遗籍考》(台湾师大国研所硕士论文)等。但是,现今还没有一种全面系统地概括这类基础研究资料的著作问世。

上个世纪末,我曾约庄大钧、王承略、刘心明、宋开玉、刘保贞等

同仁合作撰著六卷本《中国经学通史》。着手撰写时,大家共同的感觉是难以在创新性方面超越前代著说。分析其原因,主要在于基础资料掌握不全。于是决定先从经学学术资料编年入手。2005年,为了促进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科研工作的开展,时任院长的王学典教授主持策划了4个重点项目、18个一般项目作为研究院科研课题,《中国经学学术编年》被列为重点项目。

经学编年这种形式,可以细致真实地表现某朝、某代、某时、某地的经学流派、经生经师、经学传承、经学著述、经学思想、经学主潮的面貌,并通过由点及线、由线及面的系联方式,来反映某时、某地、某朝、某代的主导学术著述、主导学术思想、主导学术思潮的发展、变化,以为今后撰写多卷本《中国经学通史》提供研究基础。而当今电子检索手段,又为我们处理经学史基础研究资料众多与时间短、人手少的矛盾,提供了解决路径。

《中国经学学术编年》以时间为经,以相关传世文献资料和出土资料的编排为纬,以编年形式来全面反映西周至清末三千年间的经学史面貌和规律走向。其主要内容有五大方面:一、经学著述资料(依据其影响程度分“重点”和“一般”两类,收录时前详后略),如儒家原典的萌生、经典化过程资料,及其后历代注经解经乃至改经的著作提要等,含经书校刻、流布等资料;二、经生经师资料(亦依其影响程度分“重点”和“一般”两级收录),如经生经师的生平大事、性格思想、师法家法,以及经学传授系统等资料;三、经学事件资料,如历代王朝的经学政策诏令、“焚书坑儒”之类历史事件资料,特别是历次古今文经学斗争等资料,并含礼乐制度、馆阁校书、科举、书院等资料;四、经学思潮资料:在上述资料之外的可反映历代经学思潮的资料和反映经生经师学术思想的资料;五、经学背景资料:与经学相关的各朝各代政治、经济、文化、风俗、民情等资料。

《中国经学学术编年》的编写形式为:按朝代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辽金元”、“明代”、“清代”8卷,卷下分年(标出帝王年号、干支纪年、公元纪年),年下按月份为序

排列各条资料,各条先列月份和题目(题目要概括其下的文献原文大意),后有文献原文摘录(类似文献用“互见法”),再后是考论(有必要考订年代、考察事件或人物思想时),最后是后人“相关研究论著举目”。其中,“文献原文摘录”是重点,每条必不可少。

全书分工撰著,各卷进度不一。陆续交稿后,我在审读前,先请某些同学校核文献原文,并将所用文献版本(见各卷后《主要参考书目》)的页码标注出来,便于读者使用。今年春天,最晚一卷稿子交来。全部8卷稿成,郭森、殷仁允同学在体例统一及抽核文献方面付出了很多心力。至今审读编辑完成,交凤凰出版社出版。请同仁们在使用时多加批评,以利于改进。

郑杰文 2011年7月17日撰
2014年12月27日补

编纂凡例

一 收录内容

(一)《中国经学学术编年》以时间为经,以相关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编排、考证为纬,以学术编年形式来全面反映西周初年至清末(1911)三千年间的经学历史面貌。

(二)《中国经学学术编年》收录的主要内容含五大方面:

1. 经学著述资料(收录详略,依据其影响性大小分详、略二级),如儒家原典的萌生、经典化过程,及其后历代注经、解经乃至改经的资料(含经书校刻流布资料)等。

2. 经学人物资料(收录详略,依据其重要性大小分详、中、略三级),如经生经师的生平大事、思想性格、师法家法,以及经学传授系统等。

3. 经学事件资料,如历代王朝的经学政策资料、“焚书坑儒”之类历史事件资料,特别是历次古今文经学斗争资料,以及礼乐制度、馆阁校书、科举、书院资料等。

4. 经学思潮资料:上述资料之外的可反映历代经学思潮的资料和反映经生经师在此经学思潮下产生的学术思想的资料。

5. 经学背景资料:与经学相关的各朝各代政治、经济、文化、风俗、民情等资料。

(三)《中国经学学术编年》的收录重点是经学著作、经学人物、经学事件的原始文献资料。

二 编录形式

(一)《中国经学学术编年》按朝代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辽金元”、“明代”、“清代”八卷。

(二)《中国经学学术编年》各卷以“二级历史分期”为卷下一级目录,如《秦汉卷》下分《秦代经学学术编年》、《西汉经学学术编年》、《东汉经学学术编年》;以“帝王年号、甲子纪年、公元纪年”为二级目录;以事件条目为三级目录。

(三)每卷先列本卷目录,次为正文,后有附录(除依据书名首字笔划为序附录本卷所用书目、版本外,还依据各卷情况附录无法编年的、却富有参考价值的经学资料,如先秦之“出土文献”,秦汉之“纬书所见秦汉经学学术”。

(四)每卷正文分年(标出帝王年号、甲子纪年、公元纪年)编排;年下按月份排列各条编年资料(无月份者排在此年之月份资料后)。

(五)每条编年的结构为:先列月份和题目(题目要概括其条文献大意),后有文献原文摘录(在索引文献之书名和篇目后标出所选版本的页码),再后是“考论”(有必要时),最后是近现代“相关论著举目”。

(六)“文献原文摘录”是每条编年资料的重点,先录最早出现者,后录后世有新见者,其它相似内容之文献的处理用“互见法”。

(七)“考论”主要考辨著作或事件之疑年,或发表针对本条编年人物的思想或著述的新见解等。

(八)近现代“相关论著举目”收录与此条资料相关的近现代论著目录。

三 【文献】及【考论】所定通用版本

为保证全书各卷体例统一,特规定【文献】及【考论】中引用频率

高的古文献之通用版本如下：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1980 年影世界书局缩印阮元十三经注疏本。

“二十四史”，中华书局点校本。

《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点校本。

《太平御览》，李昉等，中华书局 1960 年影涵芬楼影宋本。

《艺文类聚》，欧阳询，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新 1 版整理本。

《经典释文》，陆德明，中华书局 1983 年影印本。

《北堂书钞》，中国书店 1989 年影印光绪十四年（1888）南海孔氏刊本。

《初学记》，徐坚，中华书局 1962 年版整理本。

《文选》，萧统，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整理本。

《四库全书》，影印文渊阁本。

《四库全书总目》，纪昀等，中华书局 1987 年整理本。

前言

赵宋王朝(960—1279)三百余年,是传统经学变古创新、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经学,以名家辈出、要籍丰厚、流派纷呈和义理深广著称,在我国乃至东亚古典学术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和典范的意义。

从历史上来看,早期中国古典学术基本上是由王官学和诸子学两大形态构成的,“王官学”为传统经学的源头,“诸子学”一变而为后世的各种专门之学,“诸子出于王官”的主流意见大致解释了两大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① 汉魏以降,古典学术虽然逐渐进入了儒、释、道三教和经、史、子、集四部兼融并摄的时代,但是以儒教(国人习称“儒学”)和经学为主轴的学术格局一直延续到晚清。经过宗周礼乐文明的洗礼和周秦诸子百家的论辩,构成王官学的“六艺”类古书转换为早期的儒学经典。随着“独尊儒术”国策的确立和五经博士制度的设置,传统经学在汉武帝时代(前141—前87)走向成熟,儒学经典文本也逐渐固定下来。^② 西汉而下,汉代的章句训诂之学、魏晋的玄学化经解、南北朝隋唐的义疏学、宋明的义理学、清代的考据学成为传统经学在不同时期的重要典范。其中,宋代经学既是汉唐经学的自然延续和内在超越,也是元明经学的渊源所自和清代经学的生成

① 所谓“早期中国”,在西方汉学中指佛教传入中国之前的先秦秦汉时代。在刘歆(约前50—23)《七略》和班固(32—92)《汉书·艺文志》的学术分类体系中,王官学是以“六艺”(即《易》、《书》、《诗》、《礼》、《乐》、《春秋》)类古书为基础的学问,附于“春秋”类的史书虽然列在“六艺”类但已具诸子学的性质;诸子学是以“诸子”、“诗赋”、“兵书”、“术数”和“方技”五类古书为基础的学问。

② 参见王国维《汉魏博士考》(收入氏著《观堂集林》第一册,中华书局1994年,第178—182页)和狩野直喜《儒学与汉武帝》(收入氏著、周先民译《中国学文薈》,中华书局2011年,第147—155页)两篇文章。

坐标。

—

一般认为,宋代经学的变古创新可以上溯到唐朝(618—907)。八十多年前,日本学者内藤湖南(1866—1934)有一段话表述得很清楚。他说:“到了唐代中叶,开始有人怀疑旧有注疏,要建立一家之言。最早的是有关《春秋》的新说。到了宋代,这个倾向极度发达,学者自称从遗经发现千古不传的遗义,全部用本身的见解去作新的解释,成为一时风尚。”^①而这种风尚的形成,是在天下秩序重新构造和新型士大夫群体崛起的大背景下,由传统经学发展的自身规律、佛教中国化的思想刺激、学校讲习活动的内在变化等多重因素促成的。^②如果放眼整个汉唐学术,正是通过总结旧注疏、开掘新议论,宋代经学成为了汉唐经学的自然延续;也正是通过高扬儒学、融通释道,宋代经学在汉唐经学的基础上实现了内在超越。

元明以来,学界对于宋代经学的发展脉络有着不尽相同的看法。如果从典范生成的历史演进来看,宋代经学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经学新典范的尝试阶段,大致包括太祖建隆元年(960)至英宗治平四年(1067)一百余年;第二个阶段为经学新典范的初定阶段,大致包括神宗熙宁元年(1068)至徽宗宣和七年(1125)近六十年;第三个阶段为经学新典范的重塑阶段,大致包括钦宗靖康元年(1126)至宁宗嘉泰二年(1202)七十余年;第四个阶段为经学新典范的再定阶段,大致包括宁宗嘉泰三年(1203)至帝昀祥兴元年(1279)

① 内藤湖南《概观的唐宋时代观》,收入刘俊文主编,黄约瑟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中华书局1992年,第16页。

② 关于学校讲习内在变化的讨论,参见拙文《略论国子监学者与唐代经学史的内在理路》(收入《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九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62—274页)。

七十余年。^①

（一）经学新典范的尝试阶段

晚唐五代，从藩镇割据到天下分崩，武人治国和战乱频仍导致学校凋敝、斯文扫地。建隆元年（960）宋太祖赵匡胤两幸国子监，宋代儒学的复苏正是从崇文兴学、尊师重道开始的。^② 由此而来，儒学经典的学习整理、讲授运用成为一时风气，以陆德明（约 550—630）《经典释文》和孔颖达（574—648）《五经正义》为代表的汉唐经学典范逐步转移。

从太祖建国到真宗立制六十余年，朝廷恢复和发扬唐朝国子监校书讲学、进士诸科取士的传统，开经筵召名儒讲读，设馆阁请名士编书，兴学校延名师讲学，重视孔、颜先圣及历代先贤先儒在国家祀典中的地位，大致形成了尊经隆儒的新气氛。在聂崇义（？—？）、李昉（925—996）、孔维（928—991）、李至（947—1001）等人的努力下，这一时期的经学以讨论制礼作乐和校刻汉唐注疏为起点，议礼成果主要是《新定三礼图》、《开宝通礼》，校刻对象重点则在《经典释文》、《五经正义》和《四经疏义》上。^③ 特别是邢昺（932—1010）重定《三经新疏》、孙奭（962—1033）刊正《孟子音义》，使旧的“五经”、“九经”体系

① 笔者所谓“经学典范”，主要是由经学诠释类型、经学注解体式 and 经学文本体系三部分构成的。其中，经学诠释类型是指训诂、考据、义理、经济等不同的诠释路径和面向，经学注解体式是指传记、章句、传注、义疏、讲义、论说等不同的注解方式和文体，经学文本体系是指“三经”、“四经”、“五经”、“六经”、“七经”、“九经”、“十二经”、“十三经”、“四书”等不同的文本偏好和组合。

② 从制度文化视域来讲，宋代儒学的历史发展集中体现在经筵、东宫、翰苑、馆阁、台谏、史院、学校、科举、孔庙、礼仪、乐律、乡里、宗族等制度及其运行方面，包括经筵讲读、文馆编书、科举习业、学校讲论、孔庙祭祀、制礼作乐等相关活动。

③ 《经典释文》所释除了《老子》、《庄子》外包括“十二经”，即《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公羊》、《谷梁》、《孝经》、《论语》和《尔雅》；《五经正义》的“五经”即《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和《春秋左氏传》，《四经疏义》的“四经”即《周礼》、《仪礼》、《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合称“九经”。另，《三经新疏》的“三经”即《孝经》、《论语》和《尔雅》，《四经疏义》与《三经新疏》又合称《七经疏义》。

出现了新的变化。与此同时,大批师儒在经筵、王府和国子监讲解经义,悄然改变旧说、缓慢增益新说,孙奭《五经节解》、《经典徽言》为官方讲义的代表作。不仅如此,孙奭本人甚至被视为孔、孟、扬、韩之后传经第一人,对仁宗朝的学术生态也颇有影响。^①在科举之外,陈抟(?—989)、种放(956—1015)为代表的隐逸化用经书道理劝导帝王治国平天下,影响了宋儒的治经路数和为人品格;在注疏之外,柳开(947—1000)、王禹偁(954—1001)为代表的文臣倡导古文、探求经旨,以宗经明道、道德仁义为依归,影响了后来的经学旨趣和古文革新。随着前代硕儒的黯然逝去和本朝新儒的不断成长,探索经学新典范之志趣粲然可见。故朱熹(1130—1200)尝说:“国初人便已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如唐人,但此说未透在。”^②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朝廷和新型士大夫以“祖宗之法”、“三代之旧”为据依,继续完善经筵讲读制度,积极改革贡举法,扩大各类学校规模,重视孔孟学统的新塑造,至庆历、嘉祐间经学新典范的尝试成为一时潮流。这一时期,旧的汉唐注疏备受质疑,新的讲义注解很迅速流行,经学名家和经学社群也应运而生。如果说宋初经学家生于

① 比如明道二年(1033),石介在写给孙奭的一封信中说:“阁下潜心于仲尼,适于尧、舜、文王,明于天、地、人之际。潜心于仲尼,适于尧、舜、文王,则为正道;明于天、地、人,则为真儒。然则,圣人之道,果不在他人,在于阁下也。”(见《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五《上孙少傅书》,陈植锷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第173页)案:石介之言或有抬高之嫌,但孙奭在真宗朝经学的代表性是无庸置疑的,仁宗朝经筵、学校师儒像冯元、贾昌朝、杨安国也多出于孙奭之门。

② 《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九,(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第3085页。案:前贤以为“宋初经学,犹是唐学,不得谓之宋学”(马宗霍《中国经学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10页),此说似有未安。从朱熹读《种放集》时所发的评论来看,宋初经学与仁宗朝经学是渐进发展、紧密相连的,详参拙作《经术与性理:北宋儒学转型考论》第五章第一节(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

北方者居多,仁宗朝经学名家却以南方人士为主体。^①比如,范仲淹(989—1052)、胡瑗(993—1059)为代表的苏湖群体,孙复(992—1057)、士建中(998—1058后)、石介(1005—1045)为代表的山东群体,欧阳修(1007—1072)、李觏(1009—1059)、刘敞(1019—1068)为代表的江西群体,黄晞(999—1057)、陈襄(1017—1080)为代表的闽中群体。^②从探索经学新典范来说,誉为“太学三先生”的胡瑗、孙复和石介最为突出,稍后的刘敞、陈襄也有较大的贡献。景祐二年(1035),孙复在写给范仲淹的一封信中说:“执事亟宜上言天子,广诏天下鸿儒硕老,置于太学,俾之讲求微义,殚精极神,参之古今,复其归趣,取诸卓识绝见,大出王(弼)、韩(康伯)、左(邱明)、穀(梁赤)、杜(预)、何(休)、范(宁)、毛(萑)、郑(玄)、孔(安国)之右者,重为注解。俾我六经廓然莹然,如揭日月于上,而学者庶乎得其门而入也。如是,则虞、夏、商、周之治,可不日而复矣。”^③孙复“讲求微义”“重为注解”的呼声,正是庆历新儒改造汉唐注疏、尝试新典范的写照。天圣以来,胡瑗设教苏湖二十余年,其学遍于东南。庆历之际,胡瑗由范仲淹推荐而入讲太学,朝廷取其经义、治事分斋教学之法为天下规矩。此间,胡氏《五经口义》在学校、科场颇为流行,所倡导的“明体用

① 比如,清儒全祖望(1705—1755)曾说:“庆历之际,学统四起。齐鲁则士建中、刘颜夹辅泰山(孙复)而来,浙东则有明州杨(适)、杜(醇)五子,永嘉之儒志(王开祖)、经行(丁昌期)二子,浙西则有杭之吴师仁,皆与安定(胡瑗)湖学相应。闽中又有章望之、黄晞,亦古灵(陈襄)一辈人也。关中之申(颜)、侯(可)二子,实开横渠(张载)之先。蜀有宇文止止(之邵),实开范正献公(范祖禹)之先。”(见《宋元学案》卷六《士刘诸儒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第251—252页)。案:前举宋初十位经学名家都是北方人士,而庆历之际经学家除齐鲁、关中之外均为南方人士。此外,庆历之际的学统与晚唐五代的学术地理关系密切,此不赘述。

② 苏湖和山东两群体即前贤所谓南系、北系,参见钱穆《初期宋学》(收入氏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另,李觏归入江西群体,参见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第十一章《江西学派》(东方出版社1996年)。

③ 孙复《寄范天章书二》,见《孙明复小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之学”影响了嘉祐、元祐学术，他本人也被誉为“文章事业望孔孟”^①。当然，囿于汉唐典范的经筵讲章比如杨安国（？—1060）《五经精义》、贾昌朝（998—1065）《群经音辨》仍占据较为重要的位置。这种新旧交涉的状况，一直延续到英宗朝。

（二）经学新典范的初定阶段

随着新讲义如胡瑗《五经口义》、新注解如刘敞《七经小传》的影响不断增强，汉唐注疏的典范意义已经动摇。同时，由于新的讲义注解之间有较大的学术分歧，各方学者统一经训的呼声异常强烈。^②熙宁元年（1068）王安石（1021—1086）入侍经筵，标志着经学新典范转入初定阶段。

神宗在位十八年，在“祖宗不足法”、“法先王之意”的变法背景下，朝廷在经筵、科举、学校、职官、礼仪、农商、兵法等制度改革中贯彻“经术者所以经世务”^③的理念，推行进士科罢诗赋、试经义以及废罢明经科的新政策，学校实行三舍法，提升孟子在国家祀典中的地位，“新学”成为本朝第一个官方新典范。从入侍经筵、参知政事起，通过排抑老成持重之辈、起用新晋科第之人，王安石在东京（今河南开封）很快拥有了一支包括吕惠卿（1032—1111）、王雱（1044—

① 见《临川先生文集》卷十三《寄赠胡先生并序》，（宋）王安石撰，中华书局1959年，第190页。

② 比如，嘉祐二年（1059），王安石在一封写给友人王回（1023—1065）的信中说：“古者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士之有用于世也，人无异论。今家异道，人殊德，又以爱憎喜怒变事实而传之，则吾友庸詎非得于人之异论如此，可叹可叹。”（见《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二《答王深父书三》，中华书局1959年，第769—770页）熙宁元年（1068），程颢也上奏说：“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师学不正，则道德何从而一？方今人执私见，家为异说，支离经训，无复统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于此。”（见《河南程氏文集》卷二《请修学校尊师取士札子》，收入《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448页）案：有关经筵与宋代经学的关系，参见拙文《北宋经筵讲经考论》（《国学学刊》2009年第3期）。

③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五十九《王安石事迹上》，（宋）杨仲良撰，李之亮点校，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45页。